

吴越文明与文物

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编



勤慎论丛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期文存·卷之二



吴越文明与文物

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越文明与文物/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9
(勤慎论丛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 期文存·卷之二)
ISBN 978-7-309-09214-1

I. 吴… II. 杭… III. ①文化史-华东地区-文集②文物-考古-华东地区-文集
IV. ①K295.53②K872.5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584 号

吴越文明与文物

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 编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81 千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214-1/K · 380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勤慎论丛”序

何 俊

作为人类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而庞大的部分,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生产,应该获得怎样的支持,这原本好像是很清楚的事情,现在却成为越来越需要探讨的问题了。“勤慎论丛”仅仅只是杭州师范大学的一个学术出版项目,用于汇集文科教师独立而自由研究的学术论文,但其背后却也潜藏着我们对上述问题的些许思考与探索。

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的高等教育通过合并、升格、搬迁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扩张性发展,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青年学子们上大学的愿望。但是,接踵而至的挑战仍然很大,甚至更为艰难,这就是如何使高等教育真正名副其实,让走进校园的学子们获得的教育真正称得上是“高等”。坦率地说,这一挑战对于杭州师范大学尤为艰难。

这种艰难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在外部境遇上,由于中国的高等院校被分别归入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层次中,身份的差别决定了各种资源的差别,因而像杭州师范大学这样一所行政上隶属于中国高等教育梯状结构最低一层的市属地方性大学,其发展存在着境遇上的困难。当然另一方面,根本的困难是来自自身。杭州师范大学是在原杭州师范学院的基础上,整合了杭州其他七所大中专学校而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大学,虽然经过努力,学校整体的办学质量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但薄弱的基础要变得厚重,显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不过,世事总有它的另一面。梯状结构所带来的资源限制,通常



能够调动地方在自身可控的资源方面给予大的投入；而薄弱的基础则往往具有可增加厚重的可能。当然，一切的可能要变为现实都仰赖于人的自觉与自愿。所幸的是，杭州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要使自己唯一的大学能发展成与这个城市相得益彰的高等学府，因此不仅给地给钱给名额，造园起楼、买设备引人才，而且更期望学校能坚定不移创一流，坚韧不拔走新路。学校上下也众志成城，不甘于平庸，并将自己建设一流大学的努力形象地命名为“攀登工程”。

在这个工程中，包含了许多项目，学风建设、人才环境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科研平台建设……可想而知，这些项目几乎会涵盖学校建设的每个方面，从硬的到软的。其中，就有一个与“勤慎论丛”相关的项目，称作“人文社科振兴计划”。依常理讲，人文社会科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固有的基本内容，学校的各项正常工作必然会涉及它的建设与发展，校长叶高翔教授——一位由浙江大学的领导岗位被请来执掌杭州师范大学的凝聚态物理学家——为何还要提出专立此项目？而且校长一经提出，即获得学校党委肯定，并为全校教师认同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二：一是在高等教育的建设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该遵循人文社科自身的发展规律；二是对于杭州师范大学来说，人文艺术有着独特的意义。

其实，前者原本是一个常识，但在今天的高等教育中似乎已成为一个需要特别加以认识与阐明的事实了。20世纪以来，科学已成为现代知识系统的代名词，在中国尤其如此。然而不幸的是，人们似乎看不到科学的真正精神在于尊重面对的事实，以符合认识对象本身特性的方式获得与构建相应的认识，而是把追求真理的科学简单地化约为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具体工作方式，并进而以之范导知识生产的所有领域。因此，在科学的名义下，知识领域中的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建设面临着难以言说的窘境：明明意识到自然科学技术的那些生产方式与评价标准不能完全适用于自己领域的知识生产，却又自觉不自觉、自愿或被迫搬用或变相搬用自然科学技术的生产方式与评价标准。结果，文科领域内的学者们日益眩目于各种各样的知识生产数据、考



评表格等量化指标,而对诸如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自我与社会等真实现象与问题的关怀销遁于自己所生产的所谓科学研究的泡沫中。事实上,这种窘境在中外高校中是共有的现象,但是杭州师范大学的一流建设希望能多少改变一点这样的窘境,具体的举措就是让文科走自己的路。

至于后者,则是由杭州师范大学的历史与未来决定的。学校的前身是清末科举废除后浙江于1908年兴办的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其后演化为民国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直至1978年的杭州师范学院和现在的杭州师范大学。首任校长经亨颐先生虽然留学日本专修物理学,他本人也是近现代中国物理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但他的办学理念在人格教育,所立校训是“勤慎诚恕”,高度重视人文与艺术教育对于人的培养的意义。唯此,浙江一师不仅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镇,而且也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起源地。秉承这一传统,杭州师范大学始终有着浓郁的人文与艺术氛围,这不仅与过去的杭州相映衬,而且更与杭州未来的愿景相吻合。因此,杭州师范大学希望自己成为“人文学堂、艺术校园”。

只是,对于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早已成为一个强大的“他者”。人们希望摆脱这位“他者”的笼罩,成为自在的主体,但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却似乎早已陷入思维定式与路径依赖,以“他者”为依归,或随风起舞,或亦步亦趋。更何況,对于人文社科的知识生产而言,整个认知与评判系统并没有根本改变,虽然人们都已承认问题的严重。

尽管如此,“人文社科振兴计划”的设立终究为杭州师范大学的文科教师打开了一页可以仰望天空的天窗,可以让有心愿的人从这页天窗放飞自己的梦想。譬如,在依旧或者必须忙着搭建平台、组织团队、申请经费……以外,我们还觉得“人文社科振兴计划”应该充分肯定、支持、鼓励文科教师进行独立而自由的研究,为此特意取来校训中的前二字,设立了“勤慎研究项目”。按照经亨颐先生对校训的解释,“勤”就是孔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好古敏以求之”、“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经先生深信《周书》所讲的“业广惟勤”，还有《韩子》所说的“业精于勤”。对于“慎”，经先生既取孔子对子张的回答：“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又取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并申言：“此虽不明言慎而曰惧，曰好谋，则慎之意也。”因此，“慎”实是严谨与智慧的统一。我们相信，一个秉持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人文社科学者，在与流水线般的知识生产保持着某种距离、有点冷清甚至不免寂寞的状态下，如果还能真正生产出知识精品，唯有坚持“勤慎”二字。

原本希望，经过数年的努力，“勤慎研究项目”可以垒土成丘、集腋成裘，将大家的研究成果加以汇集，编成“勤慎论丛”。适逢以人文艺术为特色的《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今秋迎来第200期的纪念，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同仁们建议，从《学报》的论文中精选一批论文，按照主题编成若干册，作为“勤慎论丛”的第一批，这些来自海内外学者、成于不同年月的知识产品，既可以作为对《学报》200期的庆贺，又呈现了“勤慎研究项目”的旨趣。这的确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建议，而且毫无疑问，这是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它们为后续的“勤慎论丛”作了精彩的开端。

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期待不断延续的精彩！

2012 年教师节



目录



“勤慎论丛”序	何 俊(1)
论吴越文化研究	陈桥驿(1)
近代的吴越文化	董楚平(11)
吴越艺文志	张兴武(25)
虞舜传说与吴越文化	顾希佳(43)
跨湖桥遗址的人们在浙江史前史上的贡献	吴汝祚(57)
从河姆渡的陶质耳栓说起	邓 聪(68)
大禹、会稽与夏文化	徐建春(80)
越国都邑、疆域考释	邹身城(94)
论句吴和於越的国家组织	陈剩勇(105)
地域的履历	
——浙江省奉化县忠义乡	[日]上田信著 钟种译(120)
姑末考	
——兼论江南河谷平原地带中历史人文地域之形成	
.....	钟 种(145)

吴越民族性格述略	金永平(169)
论吴越国的海上外交	何勇强(181)
《吴越备史》平质	
——吴越国文献资料整理研究之一	李最欣(193)
编选后记	朱晓江(201)





论吴越文化研究

◎ 陈桥驿

作者简介:陈桥驿(1923—),男,浙江绍兴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

吴越文化研究近年来成为一种区域文化研究的热门。建立了几种学术性组织,如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吴文化研究会、吴越史地研究会等,经常举行吴越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包括国际学术讨论会,如1990年在杭州举行的首届国际百越文化讨论会等,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许多专著,成果累累,美不胜收。吴越文化研究的兴旺发达,不仅是吴越地区学术发达的标志,其实也是我国学术界繁荣兴旺的标志,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

吴越文化也和汉文化、楚文化及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是一种区域文化,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属于史前研究。研究的范围很广,课题极多,具有很大的研究潜力和发展前途。其实,在历史上,吴越文化研究发轫甚早,绝非肇始于近代。例如《越绝书》,我早年作过考证^①,这是一种先秦著作,东汉之初,袁康、吴平对它作了一番整理,从汉人的角度,进行了某些增删,这其实是对吴越文化的早期研究。又如《吕氏春秋·知化篇》:“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

① 参阅乐祖谋点校本《越绝书》卷首拙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用现代概念来说,这是一种吴与越的比较文化研究。上述例子,都是最早的吴越文化研究。以后,这种研究未曾中断,例如《汉书·地理志》“号曰句吴”,唐颜师古注:“句音钩,夷族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四:“于、於,皆越人夷语之发声,犹吴人之言句吴耳。”及至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盖余姚如余杭、余暨之比,皆越之方言,犹称于越、句吴也。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无得而详。”^①以上颜、刘、李诸学者,其所表述,均是古代越语研究,当然也属于吴越文化研究。近代还有不少老一辈学者,如罗香林、卫聚贤、蒙文通、顾颉刚、谭其骧、杨向奎等,从各方面研究吴越文化,发表了许多论文。此外,在国际上,特别是日本与越南,在这个领域中从事研究的学者也很多,而在美国、俄罗斯和西欧,也有一些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最近二三十年中,由于第四纪学、古地理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检测手段的飞跃进步,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大量发表,因而推动了吴越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如前面指出的,竟至于形成了一个学术界极感兴趣的热门。我个人因为身居这个地区,而又是从从事历史地理工作的,所以也曾对这个领域稍作涉猎,撰写过一些文章。近年来几次到日本讲学,不仅与日本学者就吴越文化作过讨论,并且还在一些大学和电视台讲过这类课题。去年到北美讲学半年,发现太平洋彼岸竟也有一些汉学家关心史前的越人活动,甚至论及他们有横越太平洋的可能[1]。估计这方面的研究,今后还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所以不揣浅陋,在今后的吴越文化研究方面,发表一点浅薄的意见。

第一是有关吴越文化的基础研究问题。吴越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这个区域的主要范围,北至今江苏长江南北,南到今浙江浙东山地丘陵。史前的吴越文化是在这个地区萌芽发展起来的,这是这种文化的地理基础。要研究这种文化,首先应该了解这种文化赖以萌芽发展

^① 《息茶菴日记》,《越缦堂日记》二函十一册,同治八年七月十三日。



的自然环境。我在拙作《多学科研究吴越文化》[2]一文中指出：“要研究一个地方的上古文化，首先要清楚的是，当时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是陆地，还是海洋；是一块冰雪覆盖的陆地，还是生物丰富的陆地。”由于第四纪学和古地理学在最近几十年中的发展，我国东南地区从更新世到全新世的海陆变迁过程已经基本清楚。所以今后的吴越文化研究，有必要对这个地区的史前自然环境进行比较深入的探索，使吴越文化能够真正地落实到一个比较明确的自然环境之中。例如对于良渚文化，这是吴越文化中的一个分支，我曾经写过《论良渚文化的基础研究》[3]一文。但是由于我所能利用的科学依据，只是良渚一个小地区的放射性碳素测年数据，其余的部分，只不过是依据附近地区的若干第四纪研究资料和现代的1:10000地形图，所以其实是很粗糙的。要把古代吴越地区的自然环境研究清楚，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过去有的学者研究吴越文化，主要是依据一些古籍，其中有的是很不可靠的传说和神话，再加上若干没有经过科学检测的出土物，择需征引，随意推论，这样的研究成果实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吴越地区的史前自然环境研究，现在看来最值得注意的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假轮虫（*Pecudorotalia*）海退时期，亦即晚更新世以来这个地区陆地面积最广阔的时期。现在已经探明这次海退的最后一条贝壳堤，位于今海岸以东约600公里，在现代海面（黄海零点）以下155米，放射性碳素测年为 14780 ± 700 年[4]。由于越人的祖先此时已经出现，所以这个时期吴越地区自然环境的研究，特别是绘制一幅陆域范围和地形示意图，实在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时期是卷转虫（*Ammonia*）海进时期。由于这个时期是越人流散的时期，《越绝书》①和《林邑记》②所记，在越人之中出现“内越”和“外越”的分别，就是这

① 《越绝书》卷八：“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又同卷：“以备东海外越。”

② 《林邑记》已亡佚，《水经·温水注》：“《林邑记》曰：浦通铜鼓、外越，安定，黄冈心口。”又“《林邑记》曰：外越、纪粟”。《水经·叶榆河注》：“《林邑记》所谓外越、安定、纪粟者也。”



个时期由于海进而发生的。为此,作出一幅相对正确的卷转虫海进海陆分布图,在史前吴越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第三个时期是卷转虫海退时期,由于这个时期,海岸逐渐扩展,今苏南、杭嘉湖、宁绍诸沼泽平原开始形成,而吴越人在史前就对这些沼泽平原进行改造利用。从地质年代表来看,这个时期是很短促的;但从历史年代表来看,这个时期却是漫长的。当然,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记载中,吴越地区的历史时期开始较晚,尼罗河畔的吉萨金字塔建立于公元前 30 世纪之初,而吴越地区进入历史时期始于《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的“于越来宾”,其时已在公元前 11 世纪之末。尽管历史的起步较晚,但这个时期吴越地区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对于吴越文化的研究,较以前两个时期实在更为重要。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很少见到学术界有这类研究成果的发表。

在吴越文化的基础研究之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越人的来源问题。对于这个地区的远古人类,现在我们的主要成果是所谓“建德人”的发现,而且有铀系测年所得的两个数据,即 9.7 ± 0.8 万年和 10.8 ± 0.9 万年[5]。建德人是不是越人的祖先?他们是不是因为星轮虫(Asterorotalia)海进而退入山区的?由于至今还没有看到体质人类学家在这方面作出进一步的研究,所以我在过去作出的所谓建德人很可能是越人的祖先的推论,也有待这种基础研究的深入,才能得到证实。有关这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吴、越是否同族,蒋炳钊先生在其《吴越是否同族》[6]一文中,归纳各家意见,列举了八种不同的说法。不过所有说法,都来自对古代文献记载的不同解释,尚无体质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发表。

必须看到,对于吴越文化的研究,吴越地区的自然环境,是这种文化演出的舞台;而吴越人,或者说吴人和越人,是这种文化演出的主角。所以这种基础研究十分重要。不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吴越文化,完全依靠古代文献和一些未经科学检测的出土物进行假设和推论,时至今日,这样的研究显然脱离时代,脱离科学的发展,其研究成果不仅缺



乏科学依据,甚至会南辕北辙,成为笑柄。

第二是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在吴越文化研究中的意义问题。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对于中国南方史前世界所展现的场景以及对整个中国远古研究的划时代意义,这是许多人都承认的。这中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中华民族起源一元论的破灭。关于这一点,不少人口头上承认,但其实,长期以来形成的旧观念却并未改变。中国的旧传统,特别是儒家的传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用这样的观念研究吴越文化,则越为禹后,吴为周后,就是很自然的事。《史记·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而《匈奴传》也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使人恍悟,南蛮舛舌、祝发文身的越王,与韦鞬毳幕、羶肉酪浆的单于,原来是一对兄弟。而“同气共俗”^②的吴和越,却来源不同。《吴世家》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昔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弟也。”当然,禹后、周后都是一样,反正都是一脉相承的汉家子孙,是正宗的嫡传。从中华民族起源一元论的观点来看,这些记载无疑都是可以接受的。特别是这种说法后来成为历代统治者化夷为夏的手段,所以尽管有些学者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还是能够获得多数人的拥护而一直流传下来,而且奉为“正宗”。对于夏人派无余和周人派太伯南下执政的事。我在拙作《关于禹的传说和历来的争论》[7]一文中,曾经譬喻为:“宛如近代维多利亚女王派遣一位总督到印度一样。”其实这中间还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当年奉维多利亚之命东来的英国官员和住在次大陆的印度人,尽管服式互异,但彼此都是衣冠楚楚的。而无余和太伯则不同,他们冠冕袍服而来,但接待他们的却是一群祝发文身的野人。这个场面实在是荒唐滑稽的。正如王充戳穿禹南来会计(会稽)的故事一样:“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考之无用,会计如何?”(《论衡·书虚篇》)当然,一部《论衡》显然不是四书五经的对手。而

① 《诗·小雅·谷风·北山》。

② 《越绝书》卷七:“吴越二邦,同气共俗。”



到近代考古发掘盛行以后,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出仰韶遗址,在一段颇长的时期中,这是中原最早的新石器遗址。仰韶文化的出现,实际上替中华民族起源一元论助长了声势。尽管这期间史学界兴起了疑古之风,几位著名学者带头,向许多长期来为儒学传统控制的史学领域发起了进攻。当然,儒学经典中描述的中国上古历史,如我在拙作《水经注记载的禹迹——再论禹的传说》[8]一文中所说:“对于上古历史,特别是经过儒家打扮并且统一了口径的上古历史,它们与神话、传说的差距,有时实在不大。”但问题是,疑古派的文章,主要也是依靠古代文献所作的推论,同样拿不出真凭实据,例如顾颉刚提出,禹治水的事不过是个神话,而且认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9]。顾的论文发表以后,另一位学者冀朝鼎非常支持,他指出:“顾颉刚对古代中国历史文献的各种资料作了大胆的分析与比较之后,便否认了关于禹与洪水问题的传统观点。”但是冀最后仍不得不说:“将来新发现的证据,可以证实也可能推翻顾颉刚所作结论的积极贡献。”[10]冀朝鼎提出“新发现的证据”,即是因为顾的文章在当时还没有真凭实据。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真凭实据,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在年代上早于仰韶遗址。越人就是越人,吴人(假使吴越不同族)就是吴人,他们不必再借助于无余(无余其实是个越语人名)和太伯之流的人物介入其中。当然,吴越文化很早就受汉文化的影响,汉字的使用即是其中之一。但是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秦以后,越人流散,而迁入这个地区的汉人,也受到了当地的吴越文化影响,其中有些影响如淫祀滥祭等,一直保持到今天。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文章,引经据典,考证禹怎样到会稽召开全国诸侯会议,防风氏怎样因迟到而受诛,禹后来又如何葬于会稽,以及无余、太伯不远千里南下领导一群祝发文身的蛮子等,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也还有书刊有兴趣发表这样的文章,而对河姆渡的划时代发现和第四纪学、古地理学等科学成果无动于衷,说明儒学传统确实渊源深厚。



第三是吴越文化研究中应该广泛地利用科学的检测手段的问题。关于这方面,我曾经就热释光测年举过一点例子:“1970年,英国牛津大学考古所曾对该所收藏的9件中国六朝陶俑进行热释光检测,结果其中的6件是赝品。1972年,该所又通过热释光测出他们收藏的22件中国辉县陶全属赝品。这些六朝陶俑和辉县陶,在收藏过程中,当然经过不少自以为有经验的专家包括老式考古学家们的鉴定,但结果却是许多鱼目混珠的假古董,这就说明了科学的检测手段的必要。”[11]

现在,科学的检测手段日新月异,仅仅是测年的方法,除了比较习用的放射性碳素和热释光以外,还有铀系、钾氩、穆斯堡尔谱、古地磁、中子活化、氧同位素比等,当然,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误差,但误差数不大,例如前面提到的卷转虫海岸的贝壳堤测年,在一万五千年中,误差数只有七百年。绝对不会再出现著名的牛津大学考古所收藏假古董的笑话。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前几年关于萧山城山(越王城)的争论,城山顶上有一些堡垒状的遗迹,有些考古学者认为这是越王勾践为了抗御句吴而兴修的军事工程,符合《越绝书》对于“固陵”的记载^①。但也有考古学者认为这些堡垒状的东西是近代的事物。像这类时代悬殊的看法,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热释光加以解决。另外,对一个地区史前的自然景观的研究,孢粉分析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这种方法可以清楚地复原这个地区的原始植物群落。在吴越地区,对于崧泽遗址曾经作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孢粉分析检测,获得了较好的成果,可以为证[12]。

在这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研究经费不足,不少从事吴越文化研究的学者得不到研究课题,也就是没有研究经费。侥幸得到某种课题的,经费也非常有限,很难利用科学的检测手段。有的学者,他们尽管对这个研究领域极感兴趣,也认识到科学检测手段的重要性,

^① 《越绝书》卷八:“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



但是限于资力,不得不一直使用最廉价的研究方法,即单纯地依靠古代文献。这显然是最近一段时期中,吴越文化研究缺乏优秀作品特别是突破性成果的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值得引起学术界有关领导的注意。

第四是吴越文化研究的学者队伍问题。在历来从事吴越文化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中,有不少知识丰富,功底扎实,并且作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科学的进步,研究者的更新换代,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新一代的研究者正在不断崛起,继续老一辈的研究工作。为了使吴越文化的研究随着前面提及的几种具体问题,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能够跟得上科学发展的形势,对于新一代的研究者,在知识基础和业务水平上就有更高的要求。从学术领域说,吴越文化研究属于汉学研究的范畴。周法高教授提出的关于汉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其实也就是吴越文化研究者应该具备的条件。他所提出的条件是:

首先,“汉学研究者必须能利用新旧的资料”。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了解旧资料,一方面要能充分利用新资料,才能允得其中,汇南高北大精神于一炉,合古今中外而治之”。

其次,“汉学研究者必须能利用科学的观点和科学方法”。在这方面,他以中国语言和中国史的研究为例,他认为这些学术的研究者,必须“通晓语言学、史学、哲学的原理和方法”。

最后,“汉学研究者除了通晓中文外,应能用另一种(或一种以上)通行的语言自由阅读”。在这方面,他还提出一点补充:“如能自由阅读英语,可读之书甚多,但如作为专题研究,即尚嫌不够,法、德、日、俄语都很重要。”[13]

周法高提出的汉学研究者的条件,其中一、二两者与本文上面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一致的,而他所提出的第三个条件,对于新一代的吴越文化研究者,确实至关重要。可以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上海书店1995年出版了新修的《普陀山志》,从总体来说,这部老书编得不错。普陀山的佛教文化,其实也可以包括在后期的吴越文化研究之